

哀悼 翰屏

郝 谦

翰屏！翰屏！翰屏！

喊一声翰屏，

哭一声翰屏！

以前声声相应，

而今千声万声，

怎么一声也没有回应？

莫非你未听到我的呼声，

我未听到你的回音？

啊！我们两个都是聋子，

恐怕谁也不肯相信。

奉到县委的电报，

说你已病故离开了人间。

离开了人间呀！

虽然不是迷，

总是在脑袋里打圈圈。

叫儿媳们去亲眼看一看，

果然呼不应，

一点未虚传。

啊！翰屏！翰屏！

你怎能忍心抛弃同志，老友

使我终夜难眠，尽日不安！

离开了人间，

就相隔一个“阴间与阳间”

生死不相见呀！

谁把我们之间的咽喉割断，

纵有千言万语也传不到
你的耳边。

永远听不到你习惯的语音

——我们幸运地看到了

今天，

还希望看到明天和后天。

呜呼！翰屏！

人之相知，

贵相知心，

个人的一生，

功过是非，

自然有历史的鉴证，

但内心的深处，

只有我们的党，

才能分别得清。

同志之间谁人尽知？

几十年来又有几个知心啊！

过去你总是相信不深。

解放后三十多年来，

我们的通信相当多，

最可贵的是深刻交心。

在有些不同观点的认识上，

通过事实得到正确的证明。

我们都有无私的诚意，

坦白的胸襟。

个人的一生，

是就是、非就非，

谁也没有丝毫的隐避，

只有互相关心。

* * *

在学生时代的每个寒暑假，

都回到县城办平民学校，

作一些反地反封建的宣传。

我们也作过三人的画展，

有人说新文化传播的一端。

募捐赈灾运动：

连年兵灾匪患，

几十万饥民吁地呼天。

我们有领导有组织地团结各

方面的力量，

完成反军阀战争救人民死活

有政治意义的募捐。

在太革命时期：

大搞农民运动，

改变旧团练，

建立新武装。

我们的枪口要对外，

国际歌声震动城乡。

“三三一”惨案之后：

军阀刘湘派兵到綦江反共

——“剿赤”人民遭殃。

我们以武装反剿赤，

击退了敌人申文英曹燮阳。

以革命武装消灭反革命武装

是中国革命最正确的方向。

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工作，

责无旁贷，不用夸张。

在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

你在涪陵来信说，

省委叫我放下自己手上的

武装，另有任务，

那就活活地变为无理服从的

奴隶主义，

没有灵魂的走肉行尸。

不是为个人的名誉地位，

是给人民留下可耻的残躯。

虽已承党交给我掌握部份地

方武装的光荣任务，

可又是一个不中用的东西。

惭愧呀！惭愧！

书生呀！书生！

真是幼稚无知。

只好接受教训，

引咎自居。

革命的道路不是平坦的，
做到老学到老，
从经验教训中得到保证。
革命不是从幻想中得来，
而是从实践中产生。
不要一时失败就悲观失望，
不要一时胜利就眼胀头昏。
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
是我们革命的唯一命根。
大革命遭受挫折以后，
不改变中国革命的路线，
不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是我们遭到重大损失的主要原因。

曾记否？想当年，
我们又怎么不是在这个
范围内出死入生？！

呜呼！翰屏！
革命之难，
胜利来之不易。
我总觉得
个人的人生观，宇宙观——
世界观，

是决定我们作什么人？走什么路？做什么事？达到什么目的之唯一标准。

我初听肖楚女同志说：
革命是有杀头，流血，牺牲的危险，
要有大公无私的精神，才能承担。

但是，

“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
的口号又是不完全。
有谋无勇不行，有勇无谋也不行。

应该是：

有谋有勇，有勇有谋，
智勇双全，德才兼备，
才能担当革命重任，
完成革命大业。
牺牲是不可避免，
政策策略战略战术要认真。
革命是主动不是被动，
要我们指挥敌人，
不让敌人来指挥我们。
经过几十年的经验证明，
这便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针。
永远难忘啊！

至今还铭刻在心。

* * *

呜呼！翰屏！
亡友！翰屏！
相识满天下，
知心能几人？
个人的一生，

也有不可避免的遗憾！
只要自己胸怀坦白，
让它去教育后人。
祖国今天，欣欣向荣，
前途远大，灿烂光明。
永别了，老友！
安息吧，翰屏！

陈翰屏 生于一九〇一年九月
卒于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霍绍文挽于一九八四年七月中伏日

邹进贤烈士传

陈翰屏

邹进贤，蔡江县古南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杰出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忠实的中国人民革命战士。他于一八九九年三月十五日出生于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弟兄四人，大哥邹体仁善刻字，二哥邹齐美在城内中街经营小书店，进贤居三。因家境清贫，仅读私塾数年即辍学。青年时，豪侠尚义，善交游，好打不平，且有志求学。一九一九年蔡江旅外学生回县，为团结青年互励学行，组织“蔡江青年砥励会”

（以下简称“青年会”），开展文化体育活动。进贤即加入该会，勤奋自学。一九二〇年春，青年会开办补习学校，当时有志升学的青年如霍步青、胡平治、霍绍文等同志均到该校补习。进贤更得到同志、朋友的帮助，于是年秋季相率考

入重庆的联合中学（系旧学制中学，相当于高中）。进贤因家庭经济不能供给普通中学毕业，同时有志于开发实业，仅在联中三学期，即考入成都高等蚕业学校（系官费生），一面达到升学深造的要求，一面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进贤入高蚕后更加奋勉，除孜孜不倦地钻研科学外，并喜读当时《响导》、《新青年》、《学生杂志》、《中国青年》、《努力周刊》等进步刊物。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科学的文章，对他的启发很大，使他深感未来世界的前景光明，胸襟大为开阔，遂以救国救民，改进社会为己任。与朋友同学写信，均大谈这方面的问题和救国救民之道。

一九二三年，进贤即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不仅得到革命组织的培养，且通过学行励进社和马克思学会等进步团体，组织和团结了许多进步青年。由于他健谈好辩，爱帮助朋友，并在团体中服务，不辞劳苦，性情爽直，说干就干，大家都敬重他，并愿接近他，以致他在青年中威信很高，并在团体中担任了不少职务。课余除奔跑忙碌还要写文章投报刊，给朋友写信讨论问题。如他给重庆联中校董步青（革命烈士）的信，就提出和蔡江青年讨论如下问题：

1. 现在青年人的内心修养和身体训练真缺乏得很。我辈与其谈不关痛痒的事，不如讨论些保存良心，而不为恶俗所染的问题。怎样养成日常生活的良好习惯、怎样养成我们的真勇敢，怎样训练我们的办事才能，怎样去适应团体生活，等等，都是我们青年应考虑和加强修养锻炼好。

2. 现在的教育目的真多，我们若望他们来当引导，无异以盲导盲。那末青年处此黑暗时代而无正确指导的途中，若不结伴而行，相互帮助，青年是何等的孤独沉闷啊！而且自身是好大的危险啊！比如现在有许多人主张学生出而干

政，学生处此两重压迫之下，一是内有祸国殃民的军阀，二是外有各国帝国主义互相勾结而为祸乱，学生只是埋头读书吗？还是一要读书，二要干政？倘有干政的可能，应当读哪些书？干政如何着手？干政的目的何在？

3. 现在的学生谈改造社会，已成为一种口头禅。我们将眼睁睁看：学生改造到什么程度，是前进或是后退？如何退？当研究失败的原因和后果，学生能改造社会么？其实学生必须他人改造的地方多得很……

从这封信，可见他很注意青年的修养和团结青年改造社会的问题。

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间，綦江县兵灾匪患，人民痛苦不堪。进贤同志虽远在成都，对桑梓人民疾苦异常关怀。每接乡人来信述及地方兵灾匪患情况，即奔走以告省中同乡，共谋声援办法，并给旅渝留学青年去信，鼓励其爱乡爱国。如信稿中有：“桑梓事你们得些近况没有？唉，越趋越下了！全县之大，仅南山坪环山半面与太公山干净耳。人民失业，盗贼充场，公产荡尽，食谷耗完。因无抵抗之可能，民失正气之振作。朋友，欲救綦江，欲救中国，还是靠青年努力啊！你们研究科学而外，看看中国大事没有？中国人民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受军阀之为害，我们应该怎样救中国、救自己呢？你们感觉到没有？如召开旅省同乡会商讨对策，推举代表，向军政机关请愿，发快邮代电，向地方驻军上级部队呼吁，要求调遣防军痛剿土匪，免派捐税，发给赈款，特别是免苛捐杂税三年，以救民命。”以此主张联络旅渝同乡会和县里机关团体一致呼吁，由此可见进贤同志不满现状，关切桑梓父老疾苦的心情。

进贤同志因幼时辍学，深感无力读书的痛苦，欲救中

国，必须唤起广大人民的觉悟，要致富图强，必须发展文化教育。于是约集同学创建平民教育社，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亲自起草社章，征求在校青年和社会热心教育人士入社；发起募捐，并在课后作失学儿童调查和成年工人调查；开办平民夜课学校，笔墨纸张和课本全由学校负责。开办这样不要钱的学校，有些人还不相信，有些家庭对子女入学问题漠不关心，因此初贴招生广告，报名入学的人不多。进贤同志主张组织青年到街巷宣传，又亲自草拟和印发宣言。宣言说：

“你们做买卖和务农作工的人，想读点书求点知识吗？我们特为你们设有夜课班，白天既能谋生活、夜间又能抽时间来读书识字，学写信、写帐、打算盘，这是你们再好没有的机会了。你们有些儿女读不起书吗？或者你们有些嫌那些学校教得不认真吗？我们特为你们设有国民部两班，还添设写信、写帐、打算盘等课程，教学非常认真，务使儿童受益，这也算是你们送入子女入学读书的好机会了。我们并不征收学费，而且还斟酌津贴无力读书的学生……”通过这个宣言的散发和讲演，报名入学的男女就有了一百多人。进贤同志担任各级常识、甲级国语、作文，并担任训育主任。此后，要拿出大部精力来办学校，他的工作更加忙碌了，但是他从不感觉劳累。这主要是他生活有秩序，时间有适当安排。他每日仍是读书、写信、写文章，备课教书，参加社会活动，条理井然，足见他已有一定的修养和办事才能。同时他还有内省功夫，不断检查自己，努力克服缺点。如他自制的功课表的项目有：勤学、诚实、谨言、秩序、谦逊、俭约、清洁、信用八项。每日用正负号（+、-）填入，每周检查一次记于日记本上。为了发扬自己的优点，克服缺点，常求教于朋友，请提意见，大有君子“闻过则喜”之概。

进贤同志热心社会事业的根本目的，主要是改造社会。由于切身感受綦江人民遭受军队蹂躏和土匪抢劫的痛苦，他认为首先要建立社会秩序，安定人民生活，才能发展文化教育，兴办实业，因此，主张倡办团练，青年应参加地方团务活动，掌握武力才有可为。他不断向綦江团练局局长写信，信中说：“报纸为鼓吹什么的先导工具，我们如要拿出一个目标来办团——自治民团，使一般民众了解，应由团练局创设一个报纸，专载民团办法，各地匪势情况，民众所受痛苦，以及各处常练与民团的勤惰成绩，才能引起一般的注意。其次是军事物品，快枪利弹固然要准备，但因价值过昂，且来源罕少，反受其绝大牵制。我以为团局对枪杆、火药、刀矛总宜多多设备，一则价值便宜，再则可供急用，而且还可使匪徒畏惧我们的土家伙。”以上仅举其建议中的两点。如他给霍步青的信有：“留省学会要请你们注意的有两项事：1. 学习办团务，其中理由无待赘述；2. 请罢三年捐税……希你们大吹特吹之。同乡会还主张一件重要事，现在全县已沦于匪区，若联团剿杀，则易引起群众之变，因许多皆系被迫而成。为今之计，宜公推干才之人从事招抚，被胁迫者收编为团练，其余则不难除也。你们接近桑梓，希尽力鼓吹之。”足见他之眷恋乡邦，热中于团务。

(二)

一九二四年，进贤由高蚕毕业回县，即积极从事团务活动，担任团练局总参议，并主持青年会会务和青年学校校务。当年驻军集境，匪患初平，对恢复地方秩序，整顿教育事业，建树很多。特别是使青年的社会活动，骤然活跃起来，对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传，影响人心极大。一九二五年

春，由孙中山先生主张的国民会议在北京召开，进贤同志当选为四川出席代表，在北京会议后到上海，适“五卅惨案”发生，即留沪参加反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同时已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秋由上海回县，担任蔡江县第一高等小学校训育主任职务，并兼任青年学校国语、常识课程。他对学校职务是驾轻就熟。在课余即从事革命活动，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发展党团组织。当时在县进步青年有霍步青、危直士、霍绍文、胡平治、潘志寰（其中有的是共产党员）等成为有力的助手，青年运动蓬蓬勃勃，党团组织发展极快。当时进贤同志已是成熟的共产主义战士。其表现有下列几点：

（一）是杰出的革命宣传家。具有鼓动天才，在群众大会中讲演非常吸引人，讲到沉痛时，激动得人流泪；在激昂时，使得不愿动的人也动起来。在校教学，当然很受学生欢迎。他常教学生爱什么，恨什么，国家为什么乱，人民为什么穷的道理。他爱讲惹人发笑的有趣故事，开什么会也离不开他，讲了一个要讲第二个，学生喜欢他。但他执行规章制度严肃认真，学生也敬畏他，邹老师的形象，深印在学生的心坎上，革命思想在广大青年群众中生了根。

（二）对人态度诚恳，热心帮助朋友和学生。进贤同志对人态度诚恳而又非常热情，只要有求于他，无不尽力以助。朋友有缺点，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他的批评要说到你心悦诚服，并感到很温暖。对有困难的朋友和学生，他可以倾囊相助，自己无钱也要另想办法。他每月的工资，很少拿出帮助家庭，绝大部分是拿来帮助困难的朋友和学生。当时很多有志革命的青年，欲到广东黄埔军校和农民讲习所的，事先就了解到那些人的旅费有困难，他每每带头出钱，再向

他人筹集帮助；在校学生有读不起书的，亦主动进行帮助。因此，大大解决了穷苦青年的问题。而他自身是没有嗜好，非常俭约的。对家庭没有拿钱回去，弟兄不免对他有意见，但他满不在乎。

（三）精明能干，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当时在青年运动中，各种社会运动中，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作。许多宣言文件都由他亲自起稿。每次会议分配工作，都由他主动提出担任比较繁重的担子，对同志指示工作，都是不厌其详的讲明道理，使人信服，与青年朋友写信，有关重大问题，总是洋洋洒洒数千言，热情奔放，感人最深。他这种积极负责的精神和他办事的才能，同他接近的青年，不仅是钦佩他，而且思想行为上受的影响甚大。

（四）崇尚劳动，爱清洁。凡事以身作则，走在群众前面。在綦江县高小任训育主任时，每晨早起打扫房屋，整理床铺，弄得窗明几净。提倡开辟校园，种植花木，他首先划出自己范围进行种植，每日亲自灌溉，其余教育学生划定范围分片种植。当时县高小还办有一个一年制短期师范班，均系成年学生。在高级小学班有少年先锋队的组织，每星期日都有宣传活动或远足旅行。小学生有走不动的，他就背着走，有时他还为学生挑行李。每到目的地，他就搬运桌子板凳，安排休息地方，安定下来即开会总结工作。表扬那些遵守纪律，那些勤劳服务，同时指出那些不够好，须得改正。在宣传工作结束后，亦表扬那些讲演内容好，姿势好，音调好，那些还不够，或改正注意。当时青年学生在进贤同志的教育指导下，大都有政治思想，能讲话，能宣传，并养成有优良品行和劳动习惯。

（五）嫉恶如仇，不畏强权，积极领导群众运动。当时

綦江县机关团体，多为地方土豪劣绅把持。进贤同志对他们借公肥私、压榨人民的行为非常痛恨，每在开会场合提出责问，或给以一顿痛骂方才罢休。情节重者，即组织青年群众和联系旅外学生进行清算贪污，惩办贪污或是撤下台来。地方土豪劣绅恨之入骨，莫可奈何。当进贤同志已有较大的群众基础，党组织已掌握了部分武装力量的时候，他就积极领导群众进行抗捐抗税运动，同时乡里农民协会已纷纷组织起来，进贤同时更积极组织农民进行抗租运动，响亮喊出：

“土地归农民”、“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当时土豪劣绅和反动的国家主义派，不断在广大群众中对共产党作种种诬蔑的宣传，但农民群众眼睛是雪亮的，认识到共产党才真正是为他们谋利益的，因之贫雇农不受地主的劝阻和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加入农民协会的更多。当时綦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各个斗争的胜利，是与进贤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

(三)

一九二六年春，经党决定进贤同志赴苏联学习，他即离开了綦江。到上海后，奉党中央命，又派他同张霁帆同志到安徽去完成一项任务，在郑州车站受反动军队检查，因张霁帆带有文件，进贤同志遂同张一起被捕，当即解送去孙传方的南京五省联军总司令部，经严刑拷打，邹张两人否认系同路，坚持互不认识。张因带有文件，认为证据确凿，当被反动军阀枪杀，进贤同志因无罪证口供，下狱监禁，在狱中仍秘密进行宣传活动，特别是受苦的劳动群众对进贤同志寄予深切的同情，看监的狱卒亦为所动。经党组织在外活动，进贤同志得以乘隙越狱逃脱，逃回上海，即奉中央命去苏联东

方大学学习，暂时结束在中国的革命活动。

大革命后，一九二八年冬，进贤同志由苏联回国，即奉命往广东省委视察工作，后回上海担任江苏省委书记，是年又奉派回四川，在省委担任宣传部工作，并经省的党代会选举为省委委员。一九二九年春，四川省委由成都迁重庆，进贤同志被派同罗世文同志一道到遂宁附近的射洪县所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八军七混成旅部队，对该部队进行调查研究，并积极进行武装起义的筹备工作。实际上该部队全体官兵酝酿起义的问题已有一年多了。四川省委对该部队的起义极为重视。省委和川西特委曾多次派人到部队进行了解，并作原则的指示。邹、罗两同志到部队不久，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一面决定起义时间报告省委，一面于六月初在遂、蓬边境的大石坝集合队伍举行誓师大会，打出四川工农红军第一路总指挥部红旗。在宣布革命委员会委员名单，以罗世文同志为前委会政委兼党代表，以邹进贤同志为部队党委书记，以邝继勋同志为军长以及两个师长和党代表等各级负责同志的职务后，全军官兵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同时宣布红军纪律，高呼口号，随即浩浩荡荡渡河，攻取蓬溪县。在县城休整半天后，次日即分两路出发。红军在沿途买卖公平，纪律严明，群众表示欢迎。红军在沿途县城和场镇宣传，打土豪，开仓分粮食。对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一经揭发，即前往逮捕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罪状进行镇压，人心大快。因之沿途农民群众拍手欢迎，无如反动军阀调集部队紧跟在后面追击，红军日夜奔忙，不得休整，当达到梁山县（今梁平县）时，红军已精疲力竭，而粮食弹药亦须补充。梁山地方组织建议，猫儿寨是梁山最险要的寨子，大地主囤积不少粮食和其他物资。如攻下该寨，可以短期休整，再继续前进。猫儿寨地形

险要，又为梁山战略要地，梁、开、万均为军阀王陵基的防地，实际上王陵基听说红军向梁山前进时，已调了两团兵力到寨山部署防务，而地方组织尚不知道。地方报告说寨上仅有少数团丁、且农民中有几个党员，在攻寨时，他们对寨门不落锁，红军到时则容易攻下，根据这一情况前委立即作出攻寨的决定。殊不知情势已发生变化，敌人寨上是以逸待劳，红军又是仰攻，数次组织进攻，因敌人居高临下，进攻困难，且王陵基见猫儿寨战役打响，又继续调部队到寨围攻红军。前委作出向达县边境撤退的决定，无如达县军阀刘存厚见红军攻不下猫儿寨，早已调大批军队到边境山区作了周密的布置。红军因受地形限制，进入山区，即已深入腹地。伏兵即开始猛烈的扫射。红军进退维谷，军心涣散，遂告失败。进贤同志和罗世文、卞继勋等主要负责人分别只身绕出敌封锁线，从梁、垫道上返回重庆向省委报告情况，进贤即奉省委派任秘书长的职务，省委机关于次年叛徒陈茂华出卖，进贤同志和省委书记刘愿安同志宣传部长陈攸生同志同时被捕，并被解送到反动军阀王陵基司令部。王陵基认为他们俩个都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亲自审讯。王主要想诱降他们，以达到破坏共产党全四川组织的阴谋目的，说什么“共产党无出路，国民党有前途”。进贤同志指骂王陵基说：

“你的出路是残酷压榨人民，吃人民的膏血！”王见他们动摇不得，就施以残酷拷打，如背火背兜、洋油灌鼻子等等残酷手段，他二人忠贞不屈。王陵基见诱降和酷刑都宣告破产，就决定杀害他们。而王陵基又怕共产党劫杀场，遂在一九三〇年五月七日的清晨扬言移监，（当时将他们寄禁巴县监狱）。准备就地枪杀。邹、刘两同志洞察其奸，在刚被押出狱门时，进贤同志即大骂王陵基说：“你今天只杀我邹进

贤、刘愿安，杀不完共产党。”骂后毫无所惧，表现了共产党员坚贞气节。邹进贤同志同无产阶级优秀战士刘愿安同志一道高呼口号，在离监门附近的一块坝子英勇就义。

关于办团练干部学校与反剿赤的斗争

郝谦同志讲话录音。霍凤栖整理。

按：本文系根据郝谦（霍绍文）同志1981年7月10日在綦江县志办公室的讲话录音整理。为保存翔实史料，保持郝老讲话的语言风格，整理时，除个别话句略有改动或调整外，原话照录。整理稿经本人审阅。文中小标题系编者所加。

掌握团练武装

1926年上半年“东溪米案”结束之后，中共綦江县委就准备办团练干部学校（以下简称团干校）。当时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通知我们要在团练里头掌握武装，我们就照上面的通知办。同年暑间，县里通知我回蒲河第二区任督练长（后叫区队长），督练长是拿枪的。重庆地委通知，这次办团（团练、团防），跟以前讲的办团练，联合其他县团练防匪的情况不同，性质不同，作法也不同。在团练问题上，一定要把它的性质搞清楚。首先，是由我们共产党的上级通知下来的。县里安排的都是当时国共合作期间同道活动的人。第一区（城区包括两路口），邹进贤（1925年下半年）任区团总，文森明任督练长；第二区（蒲河）区团总是陈治均，我任督练长；第三区（石角）区团总黎子良，督练长是吴玉

森，第四区（东溪）区团总是陈叔陶，罗镜秋任督练长；第五区（赶水）情况我不清楚；第六区区团总是池××，督练长周绍溪；第七区我搞不清楚。我们还是通过选举方式产生的，不是上面委派。

当时县里的情况，邹进贤、文森明无问题；二区霍树南去扶欢坝招安大匪周燮清被杀死后，霍寿南任区队长，后来他在马桑台（打土匪王开山）被打死了，如果他们不死就不得行；第三区黎子良是个袍哥大爷，又是商人，吴玉森是个穷读书人，穷教书匠，同青年砥砺会有关系。1924年国共合作，虽然还未提出统一战线，但1926年全县作这样安排，实际上就是统战工作，情况就是这样。这些人的由来，也自然有个结合，文森明、吴玉森这些人，由于青年砥砺会的关系，不得不使他们出来大家干，否则他们这些人是冒不出来的。那个社会情况，就是有这样一批人。四区陈叔陶、罗镜秋与夏家是对立的，和我们作起来很合适。区团总是文的，管政；督练长是拿枪杆，搞武装的。上面指定我和周绍溪，其他区也要通得过气，能指挥掌握枪杆的人，并要经过选举才行。这个时候，提出（掌握武装）这个问题，全县都布置下去了。

全县团练武装这样安排下去，但在1925年下半年我亲眼看到区团总与督练长的区别。这里必须提出，这个是有区别的。区团总譬如军队的政委或党代表，能指挥一切；区督练长譬如师长、团长，掌握军队。当时我就看出手上没有枪杆子就不关火。这里我对邹进贤有个很深的观察，他在县高小教课，一天提着个腾包，里面有一颗印，一束公文，提来提去。一区的区公所设在两路口，文森明在两路口很难进城，他就有那么歪，说了就算。邹进贤走路到两路口有二十华里

路，清早走去和他商量事情，下午又回城上课。他仅有一颗印，一束公文，要办事还是要有枪杆的人说了才算，凡事要文点头答应才行。邹进贤连声说：“恼火！恼火！”这证明毛主席指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很正确、很对，不是偶然的。一区的枪杆子，一开头就在文森明手里。前些年黔军进川，进进出出，拿一些烂枪把我们四川的好枪换去了，每当黔军换防的时候，文森明就在两路口去东溪一段二、三十里的沟岩岩里面，把黔军掉队时的尾队截住，缴获了一百多条好枪。到1926年的区督练长文森明歪得很，很不容易进城。我讲这个问题，是说明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意义。

1926年朱德同志在万县，陈毅同志在合川，都在四川范围内没有出去。我们共产党1925年在四川成立后，到1926年已经注意到武装的问题。当时，朱德同志在万县杨森部队，陈毅在合川搞顺泸起义，一直到重庆“三、三一惨案”，他们都在四川；我们綦江这个角角，有着这些关系。

1926年我们办团练与前几年办团、联团，扩大势力，买枪建立团防不同，时间错开，很不相同。先前，我们扶持了几个人，如夏奠言、霍树南、刘子敬，那时情况不同，在搞联团防匪，而联团的结果，后来他们都变成“剿赤”、“清共”、压迫人民残杀人民的刽子手——封建军阀的走狗，真是猫翻甑子——替狗干。1926年共产党员当督练长就只我一个，但是各区的区团总、督练长同我们的关系都好。我们作了这样安排布置之后，接着就办团练干部学校。

创办团练干部学校

办团练干部学校，就把陈治均调进城来。他原是二区区团总，1926年暑间调进城任团练局长。二区公推封鸿渐继任

区团总，此后又把老文牒李克成调任二区团总。那时，我年纪还轻，我同陈治均、封鸿渐、李克成的关系都搞得很好，没有文武之分，凡事商量好了我们就干。陈叔陶和罗镜秋的关系，也是搞得好的，只有文森明这个人翘尾巴。陈治均当团练局长，团练局就设在沱湾禹王庙菊坡亭。办团干校就是我们自己训练一些团务骨干为代替旧的各区乡旧人员作准备。团干校全部有多少人，我记不清楚了，办校的时间约有两个多月，当时很有点气魄。我们和驻军穆瀛州、县官晏云骞、江津周化成经常往来。县官和驻军旅长都是江津人。周化成同霍树南也有关系，和邹进贤也有往来，很活动，不像南川张茂春那样死顽固。

团干校举行开学典礼，驻军、县官和周化成都来参加。禹王庙大门口，进门头一幅横标就是：“我们的枪口一致向外，”这就是说要北伐，不要内战，一致打帝国主义，打北洋军阀。这口号是我提出来写的，但不是我们的独创，这是大革命时期的口号。开学时唱《国际歌》，是留法学生王极知用法文教唱的。他是重庆地委派来的，在綦江教小学。团干校办起来，干劲很大，既加强了党团员的发展和区委的组织，又对左派国民党县党部、区分部、农民运动的发展和成立农民协会等都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1926年全国的群众运动蓬勃发展，我们綦江是1926年下半年达到高潮。从1924年国共合作开始到1926年都是高潮。那时工人（主要是手工业劳动者）、农民、商人、青年、妇女等各种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都很兴旺，普遍成立了农民协会，这是鼎盛时期。我们中共县委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如果以后要把农民运动分开写，我看还找不出一个具体的农运的组织、领导和发展情况。不能单说我领导的农民运动如何，不是光